

重讀陳垣

——有關明末清初中西對話研究的幾點思考

有學者認為：近年來，中國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的研究領域出現了重要的範式變換，即從傳教學和歐洲中心論的範式轉到漢學和中國中心論的範式。

其中謝和耐《中國與基督教》（1982）、鐘鳴旦《楊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1987）、《中西文化交流史雜誌（1550—1800）》（按：該雜誌1979年創辦，初名《中國傳教士研究雜誌（1550—1800）》，1990年改為今名。）為這一範式轉變的奠基之作。最近，臺灣清華大學黃一農先生又以瞿太素、王徵、韓霖、魏學濂等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為研究物件，翔致析究了他們作為夾在中西文化間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如何自處以及應對社會變化。

當然，由傳教學轉移到當地教會的創建史，以及把基督教史研究作為瞭解中國的一個角度的范式轉換依然值得我們深入思考，並進而形成一些粗淺的認識。我認為：我們應該把中國基督教史作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應該把基督教在華傳播於中國社會的意義與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研究對認識中國的意義問題，也即爭取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在中國史研究或漢學研究中的地位問題，作為以後關注的最重要議題。這同時也是我們繼承陳垣先生基督教史研究學統的一個重要方面，因為這些端倪早於其作品中都有所表露。

第一，轉變研究物件，拓寬研究視野。中國基督教史的目的，並非單純地圍繞著傳教史的中心，梳理基督教在華布教的路徑、過程與範圍以及國人的反應等，而是應在考訂這些史實的基礎上，要有所提升，即對於研究、認識古代中國要有所裨益。不過，這一點現在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陳垣先生曾利用魏特《湯若望傳》詳細考究了順治信仰、病逝、下葬以及董鄂妃身世、康熙即位等順康之際若干重大史實，對於我們使用教內史籍以及利用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認識古代中國提供了範例。同時，鐘鳴旦先生對楊廷筠的研究、黃一農先生對王鐸的研究都對於我們認識明清社會大有裨益。

我本人最近重點研究了畢方濟奏摺，《畢方濟奏摺》是明末天主教史料中極為重要的一份中文資料，晚清黃伯祿最早將其著錄於《正教奉褒》一書中，其後研究天主教史及明清西學的大家無不徵引，但無論著錄者還是徵引者均未對《畢方濟奏摺》的上疏時間進行認真考釋，致使此奏摺內容在利用上存在極大誤區。其中特別是將南明時期中西交往之史實誤植於崇禎朝，致使歷史之顛覆。我利用中西文獻資料，對《畢方濟奏摺》上疏時間加以考證，並

力圖釐正前人研究中的一些錯誤，這些對於我們研究南明史和澳門意義極為重大，如此也拓展了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空間，同時也拓寬了中國基督教史的視野。

而對於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的個人，我們如何把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放置于個人生平、交遊及命運中去，則值得我們去關注。我在這裏談談三點個人想法：

1，信仰問題。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也帶來了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全面匯通，也即中西文化的相遇與對話。以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利用適應策略，以傳播科技知識的手段來宣教。這種上層路線的知識傳教的方式使得天主教在華早期傳播成績斐然。同時，與異質文化的相遇，也使得中國必須與之對話。於是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王徵、韓霖、魏學濂等天主教徒便開始了他們本人的中西匯通之旅。

關於明末中國基督教徒的信仰，我們試以徐光啟為例。徐光啟對於天主教的認識到底如何？他關於天主譯名等禮儀之爭態度到底如何？他如何看待冬至祭天？這些都值得我們去再次關注。還有我們曾考察了許之漸其人，他始終對於游離於天學和佛教之間，直至晚年，終於全心皈依佛門。如果單以娶妾、佞佛等標準衡量是否受洗，那麼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徒我們又該如何定位呢？這主要從個人精神世界角度去考察。

2，從個人政治生涯來看，我們還以徐光啟為例。最近，我們再次考察徐光啟與西人交遊的過程，可以清晰地發現這樣的脈絡：徐光啟的科技知識隨著他本人任職履歷的變化而變化，他西學交遊的範圍與傾向也隨之而變化，如學習數學、水利、曆法、火炮等。這是不是又值得我們去深思。在考察天主教徒的信仰過程時，我們如何能將個人政治生涯和社會趨勢聯繫一起呢？

3，個體交遊與社會思潮問題。儘管明末清初天主教在華傳播採取了知識傳教策略，士大夫接觸西學漸趨增多，這在陳垣、方豪、黃一農、謝和耐、沙百里、鐘鳴旦等先生相關研究中都有體現。但聯繫前述兩點，這些接觸西學對於其個人到底有著怎樣的意義？比如明末著名哲學家李贄曾結識利瑪竇，那麼這些接觸在其人生及哲學世界中到底居於何種地位？同時，另一面問題則是明末清初有沒有形成一定的接受西學的社會思潮？還是後人過度詮釋呢？

第二，擴充中文史料來源，推進中西文互證。其實早在民國時期，陳垣先生就主張擴大中國基督教史的史源，不僅不囿於教會史籍中，而且要擴展至教外史籍。陳先生遂利用教外史籍研究清初皇族信教之盛況，並徵引詩畫題跋考究吳漁山其人生平事業的。而謝和耐、鐘

鳴旦以及黃一農等諸位先生直接或間接承襲了這一傳統。

我本人亦長期關注中文史料的開掘。首先，中國基督教史本身就決定我們必須中西文互證，尤其注意中文史料的開掘。而中國方面，《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全書禁毀叢書》、《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等大型叢書的編輯出版，這既對中國基督教史學界形成巨大的衝擊，也對我們推進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大有裨益。翻檢這些浩如煙海的史籍，不僅讓我們重新檢討前人的史學成果，也是檢驗我們為學功夫的最好標準。當然，中國方面，大量資料庫等檢索系統的創建，對於我們的史學研究也提供了很多便利。同時，海內外圖書館尚存許多珍貴的中文史籍，亟待我們“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然而，這些至今未被我們充分重視起來，以至於有些史學成果的微引文獻範圍狹窄，且又回避了真正史源的追溯。

同時，中文史籍的不斷開拓，既推進中國古代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的研究，同時也為我們深化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帶來便利。而進一步如何鏈結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與發展中的相關政治史、文化史研究，則是我們思考的重點。這也正好回應了我所提出的粗淺認識。

TangKeJin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2.0/fr/deed.fr>